

# 训诂学与汉语双音词的结构和意义

王 宁

## 零 引言

现代汉语双音词问题是当前国内外汉语研究界十分关注的问题。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原因、双音词的历史发展、双音词的语法结构类型和语义结构类型、词与词组的区分等等,都是当代汉语研究不能不解决的问题。词汇教学(包括基础语文课的词汇教学、高校中文系语言学教学和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既要解决依“理”教学与依“法”教学的问题,也要解决深入解释每个词语意义内涵的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仅仅从共时研究的角度着眼是不够的。历时的考查证明,现代汉语双音词是从各个不同的时代积淀下来的,因而与历代汉语的词汇都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与现代汉语双音词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先秦文献语言。但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废除文言文以来,白话与文言无形之中成了对立的東西,研究现代汉语的人很少重视文言,认为二者互不相关。研究古代汉语的人则强调的是古今汉语的差异,生怕用现代语言来附会文言而错会了古人的意思。实际上,先秦文献语言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影响太直接、太强烈了,可以说,离开了文言词汇,现代汉语词汇

简直没有办法深入理解。

## 一 先秦文献词汇和现代汉语双音词的密切关系

大量的语言事实表明,口语词的构词能量,往往低于来自先秦文献语言的文言文词。例如:

**竖—纵** “竖”和“纵”在“垂直”(与“横”相对)意义上同义。而由“竖”造成的双音词中只有“横竖”“竖立”两个是结合得比较紧密的。但“纵”当“垂直”讲,却造成了“纵横”“纵贯”“纵深”“纵观”“纵览”“纵身”“纵队”等一系列结合紧密的双音词。

**丢—失** “丢”和“失”在“丢失”意义上同义。而“丢”在这个意义上组成的双音词只有“丢失”“丢弃”“丢掉”比较紧密。“丢人”“丢脸”的“丢”,“丢失”义已较淡化。大部分采用“丢失”义造的词都用“失”不用“丢”。“失盗”“失明”“失恋”“失学”“失宠”“失效”“失势”“失音”“失重”“失传”“报失”“挂失”“失主”“丧失”“损失”“流失”“遗失”“亡失”等等都是典型的双音词。

**拿—取** “拿”和“取”在“以手取物”意义上同义。而“拿”在这个意义上几乎没有造什么双音词。“取”则造成了“取代”“取舍”“夺取”“攻取”“获取”“换取”“汲取”“捞取”“猎取”“摄取”“索取”“提取”“攫取”“榨取”“牟取”等等双音词。

这种情况之所以普遍,一方面是因为口语的单音词尚能独立活动,可以临时组成词组,不必凝固成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口语词是随着白话文进入书面语的,历史的积蕴程度较浅,构词的能量也就相对较低。

另一个现象是构成现代汉语双音词的不自由语素,相当一部分保留着先秦文献的古义,例如“的确”的“的”、“除夕”的“除”、“爽约”的“爽”等。

这种现象也很容易解释。就先秦汉语的发展来说,正因为含有这些意义的单音词已经死了,没有了活动能力,所以如果被现代

汉语采用,就必然成为不自由语素。而就现代汉语来说,正因为这些双音结构中含有一个不自由语素,而且用的又是古义,自然结合得非常紧密,不能简单拆解,遂凝合成词。可以看出,正是由于词汇系统发生了总体性的变革,才使本来独立的单音词,沦为仅仅是构词成分的单音语素。

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少现代汉语双音词本来是先秦汉语的词组,它们是在后代凝成一体后再经过引申而成为双音词的,例如“责备”“要领”“明白”等。这些与先秦文献语言直接相关的词,并没有文言文味儿,完全白话化了,说明它们已不折不扣地被现代汉语吸收。

以上列举的这些现象都说明,文言与白话之间,并不存在着一个绝然相离的鸿沟。

汉语至先秦两汉时代已结束了单音孳生造词的阶段。在单音孳生造词时期,造词与孳乳造字几乎同步进行,因而积累了足够量的单音词与足够量的汉字。至此为止,汉语还是以单音词为主。魏晋以后,口语的双音化倾向日渐明显,但仿古书面语仍袭用文言,言与文一直并存,距离却越拉越大。两种并存的汉语不可能不相互影响、相互吸收。那么,白话与文言谁对谁的影响更大些呢?有人强调口语的活力,认为活着的语言必会冲击死去的文言,会不自觉地改变文言的面貌,让文言也白话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文言文直到被打倒时,还是那么酷似先秦文献语言。不论是清代桐城派的古文,还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语言一似《左传》、《史记》和先秦诸子,丝毫不为白话所动。惟有像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种半文不白的文章似有白话与文言的交融,但究竟是文言侵入了白话,还是白话侵入了文言,实在难以说清。仿古属于人为,而且是少数士大夫文人之所为,这些作者作文言文轻车熟路,要想故意躲开白话,应当说没有什么困难。

相反的,文言词汇对白话文的影响则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

因为白话文不等同于口语,它仍是文人之所为,属雅文化范畴,典范白话文的作者有相当一部分也精通文言,容易吸收文言成分。更重要的是,词汇和词义的发展不是更替型的,不可能突然地、成批成批地淘汰更新。词汇和词义的发展是累积型的,经过长时期的积攒,同时逐渐进行内部能量的调节、交换,采用旧的成分,形成新的系统。先秦汉语的单音词,一部分演变为现代汉语单音词,另一部分作为构成现代双音词的语素,大量积淀在现代汉语词汇里,这符合词汇发展的一般规律。

在汉语发展史的各个阶段,书面语的丰富和定型既依赖于从方言口语中吸收养分,又依赖于从历史的典籍中继承适合自己的书面材料。但是,由于词汇系统和词义系统内部结构的制约,口语特别是方言土语进入当代书面语的机会,往往少于历史文献语言。这不但因为典范的书面语一般与上层(宫廷与文人)文化密切相关,还因为历史文献语言由于是书面的,在传播上也有着更为优越的条件。先秦文献的词语一是通过正常的汉语发展中顺流积淀而存贮,二是直接取于同时代的文言写成的典籍与诗文。这两个渠道向现代汉语输送的先秦词语与词义都不是少数。

正是由于长期存在的言文脱节现象,造成文言对现代汉语的影响既有共时的渗透,又有历时的传承,就使解决现代汉语双音词的结构问题无法脱离先秦文献语言。通过训诂材料,使用训诂方法来搜求、勾稽先秦文献语言对现代汉语词汇的直接影响,不但可以加深对现代汉语中各种词汇现象的理解,而且可以使“五四”以前脱节的言与文之间的既差异又统一的事实,被描述得更为清楚。

如何运用训诂学的原理来解决汉语双音词形成的原因,以及它们的构词理据呢?双音词的构词理据,包括以下三方面的要点:(1)原始构词时两个语素各自的意义;(2)两个语素结合的语言原因和文化原因;(3)与这两方面原因相关的语素结构模式,这一问题还要涉及语素的书写形式。

## 二 通过训诂材料探求双音词语素的古义

前面说过,构成现代汉语双音词的不自由词素,相当一部分保留着先秦古义,而且大多属于现代不再单独使用的意义。这些意义就必须通过训诂材料来探求。例如:

失 现代汉语有“丢失”“失掉”义,这是古今延续使用的。但在“失言”“失声”“失态”“失足”“失调”“失禁”“失守”“失修”等双音词中,“失”当“放纵”讲,属古义。《说文》:“失,纵也。从手乙声”,纵即放纵,不能控制。《谷梁传·襄公二十五年》:“庄公失言。”注:“失言谓放言。”《荀子·哀公》:“其马将失”,注:“失读为逸”。逸也是放纵。这个意义现代汉语已不单用,仅在双音词中作为不自由语素保存着。

天 “天”的“天空”义是古今延续的。《说文》:“天,颠也”,《山海经》:“其人天且劓”,都可看出“天”存有“人的顶额”的古义。这个意义现代汉语早已不单用,却在“天庭”“天灵盖”“天窗”(顶窗)等双音、多音词里,作为不自由语素保存。

的 《说文》:“的,马白额也”,《易经》作“的”,可见它的本义是动物身上显著的白斑,马的白额称“的颡”。古代射箭的靶子,白底子的称“的”。所以《汉书·晁错传》“矢道同的”,注:“的谓所射之准臬也。”这个意思除保留在“有的放矢”这个成语里外,早已不用。但在双音词“的确”里,还保留着它“清晰”、“明白”的引申义。

爽 “爽”在现代汉语里常用作“凉爽”“爽快”义。《说文》:“爽,明也”,其字从“収”,表示“疏松”“疏朗”。而“爽”在先秦由“疏朗”义引申而有“差错”义。《诗经·卫风·氓》:“女也不爽,士贰其行”,毛传:“爽,差也”。《老子》:“五味今入口爽”,王注:“爽,差失也。”《国语·周语》:“经纬不爽”,注:“爽,差也。”这个意义现代汉语已很少见,却在“爽约”一词中以不自由语素保留。

除此之外,“徒”的“空”义保留在“徒劳”“徒手”“徒然”等词中,

“救”的“止”义保留在“救灾”“救火”“救难”等词中，“落”的庙成祭祀义保留在“落成”一词中，等等，都是先秦古义直接进入现代汉语双音词。要想分析这些双音词的构词理据，不了解这些语素的先秦古义是办不到的。而要了解先秦古义，离开训诂材料也是办不到的。

### 三 通过训诂材料探寻双音词语素凝结的语义和文化原因

现代汉语里的许多双音词，两个语素结合的原因必须从先秦文献语言及训诂材料中去探寻。这里所说的原因可分两个方面，一是意义本身的原因，二是文化方面的原因。

#### 1. 探寻语素之间相互选择或相互排斥的原因

风—俗 “风”与“俗”在先秦汉语里已经连用，现代汉语直接继承为双音词，两个语素完全同义。但是在组词时，现代汉语只说“习俗”“礼俗”，而不说“习风”“礼风”。究其原因，是因为先秦汉语“风”“俗”在相对而言的时候是有差别的。《汉书·地理志》：“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又说：“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可见，“风”是自然环境造成的地域特点，《后汉书·蔡邕传》注：“风者，天之号令所以谴告人君者。”所谓“天之号令”，即是自然的状况。而“俗”则是后天教化造成的社会、人情特点，《周礼·大司徒》疏说：“俗谓人之生处习学不同。”《礼记·曲礼》疏说：“俗，本国礼法所行也。”所以，古人认为“风”是不能改变的，想变只有移民，而俗是可以通过教化习学而改易的，因此有“移风易俗”之说。这就是“习”与“礼”可以与“俗”互相选择，而与“风”则不能连用的原因。

贫—穷 “贫”与“穷”在先秦就已连用，现代汉语袭用为双音词，两个语素意义无别。“贫”与“穷”在“贫穷”意义上组词的能量不相上下，例如“贫困—穷困”“贫苦—穷苦”“贫民—穷人”“贫国—穷队”等等。但是在“少”这个意义上，现代汉语双音词用“贫”不用“穷”，例如“贫血”“贫矿”“贫油”“贫瘠”等都不能换成“穷”；而在“竭尽”这个意义上，现代汉语双音词用“穷”不用“贫”，例如“穷尽”“穷

竭”“穷极”“穷究”“穷途”“穷期”“技穷”“词穷”“无穷”等都不能换成“贫”。这是因为,在先秦汉语里“贫”与“穷”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贫”是财少,所以与“富”相对。“穷”是路尽、官运不通,所以与“达”相对。这种差别,直接反映到现代汉语双音词的组合关系里。

其他如血缘关系用“亲”不用“密”,作为行政单位名称的“班组”是一个层次,“部局”又在另一个层次,等等,都必须用先秦汉语去解释。

## 2. 探寻两个语素结合后又引申的轨迹

现代汉语还有不少双音词早在古代已经结合,结合的理据存于先秦,而在结合后又作为一个整体产生引申,遂使现代用意与构词的意图脱节,要寻其造词理据,分析结构方式,仍必须向上追寻。例如:

**介绍** 周代贵族相见的礼节,主方设上宾、承宾、绍宾负责传话,宾方设上介、次介、末介负责通报,主宾双方沟通的第一环节是绍宾与末介的结交。因而有“介绍”的结合,《礼记·聘义》:“介绍而传命”,这里的“介绍”还是词组。以后引申出“为两者接通关系”的意思,“介绍”的构词理据——“介”与“绍”凝结的文化原因,反而不再有人领会了。

**责备** 先秦汉语“责”有“要求”义,“责备”本当“求其完备”讲,所谓“求全责备”即是它的原始意义。现代汉语“责备”已有“谴责”之义,与构词意图偏离。

**要领** “要”是“腰”的古字,“领”有“颈领”义,古代行刑有“腰斩”与“斩首”两类。《礼记·檀弓》:“是全要领以从先大夫于九泉也。《管子·小匡》:“斧钺之人,幸以获生,以属其要领,臣之获也。”这两处的“要领”,都是因刑法而结合的词组。因为“腰”和“颈”都是人体转动的枢纽,因而“要领”引申为“主旨”“要旨”义,遂导致使用义与理据偏离。

**明白** “白”在先秦的意义是强烈的阳光,一般只与“黑”相对,

而不与其他彩色相对。与其他彩色相对的是“素”。《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经典释文》引崔注：“白者，日光所照也。”印度历法以日盈至满（初一至十五日）为白分，日亏至晦（十六至三十日）为黑分。都可看出“白”的意思。《说文》解释古文“白”的字形为“从入合二”，“二”表空间，“入”为日光照射。较之甲、金文，这个说法不一定是造字本义，起码也反映了“白”在先秦的常用义。“明”也是日光照射状，所以有“白天”的意思。“昼夜”称“晦明”，“始旦”曰“明”，“迟明”“平明”都与日出有关。所以，“明白”之结合，基于阳光普照。而在现代汉语里，“明白”已具有“清楚”义，含义十分宽泛，与造词理据离得较远了。

**奥秘** “奥”是古代宫室西南角的专称。《尔雅·释宫》：“西南隅谓之奥”。《释名·释宫室》：“室中西南隅曰奥，不见户明，所在秘奥也。”这正是“深奥”“奥秘”结合理据之所在，必须追溯到先秦文献才能弄清。

### 3. 探讨双音词意义中感情色彩的来源

双音词意义中感情色彩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先秦文献，并具有文化方面的原因。例如：

**捷径** “捷径”一词本无贬义。《左传·成公五年》：“梁山崩，晋侯以传召伯宗。伯宗避重，曰：‘避传。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杜注：“捷，邪出。”孔疏：“捷亦速也。方行则迟，邪出则速。”周代施行井田制，田亩、道路均纵横直交。欲速行而不走正路，必是邪出。《文选·东京赋》：“回行道乎伊阙，邪径捷乎纒轘。”也以大道与捷径相对。直至《离骚》：“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才产生贬义，有了“违反道德规范”的内涵。

## 四 通过训诂材料探寻双音词语素结合的原始语法模式

1. 正因为相当大量的双音词是在先秦文献中已经结合的，所

以,有些双音词的结构模式仅仅从现代着手很难判定。例如:

颜色 仅从现代汉语看,“颜”与“色”都有“色彩”义,“颜色”一词似为联合式。实际上,颜是人的额中部、眉之间的地方,人的喜、怒、哀、乐在这个地方表现最明显。忧怒时皱眉,古人说“蹙颜”,转忧为喜,古人称“解颜”“开颜”,都是指眉间的表情。“气”是人的心情在颜面上的表现,所谓“气达于眉间是为之气,颜色于心若合符节”。孟子说:“仁义礼智根于心,是生色也,猝然见于面”。所以“颜色”应解释为“颜间之色”,是一个偏正结构的名词。“察颜观色”的意思是“察其颜则能观其色”的压缩。“颜”在现代汉语里引申出了“色彩”义,才使“颜色”成为联合结构,与构词时的理据不一致了。

因此,汉语双音节的构词法,仅从形式上去研究很难得出准确的结论。仅就使用意义而言,两个语素属于什么结构也很难判定,必须追溯到原初构词的理据。而就原初构词的意图或缘由而言,不少双音词与典故有关,远非有限的几种模式所能涵盖。

2. 不少双音词带有不同于现代的先秦古汉语语法结构模式。例如:

油滑、天大、雪亮、血红(名词作形容词的状语)

笔谈、兵谏、袋装、雷鸣(名词作动词的状语)

滚圆、飞快、溜滑、流利(动词作形容词的状语)

飞奔、绕行、跃进、渴望(动词作动词的状语)

松绑、热饭、正音、清党(形容词用作使动)

这些结构在现代汉语里已不是习用的句法结构,但是作为构词方式,还有较大的能产性。

又如,“救死”与“救生”并存,“救生”是“救而生之”的简缩。“救”是施动,“生”是使动。“纠偏”与“纠正”并存,“纠正”是“纠正之”的简缩,“纠”是施动,“正”是使动。这些都与先秦文献语言的语法结构有关。

3. 汉语双音词的语法结构,常常因为书写方式的改变而被掩盖,变得难以解释,最明显的是一部分联绵词的形成。相当一部分联绵词本来是先秦同源词的结合,或者是具有音律关系的两个单音词的结合,因书写形式改换失去理据而变得不可分析。(联绵词的推源问题是一个专门而复杂的问题,本文暂不讨论)例如:

刻苦 “刻苦”有“勤苦”之义,“刻”字难解。《说文》:“核,苦也。《一切经音义》引《通俗文》:“患愁曰核”。“核”训“苦”,即《孟子》“苦其心志”的“苦”,“刻苦”用于脑力劳动,理据存于“核苦”。

检阅 “检阅”是现代阅兵的叫法,外交礼仪也用。有些工具书只解作“翻检阅读”,“检”的本义是“书署”,一般确用于翻检文书。但现代汉语的“检阅”指观阅大规模队列,从字面上很难解释。古代打仗有告庙之礼,出入都要“以数军实”,也就是点人数、军械、车马数(出时点自己的,胜利归来包括清点俘虏和俘获物),称作“简阅”。“阅”与“税”同源,有“计数”义。“简”是“简书”,按简查数。“简阅”是名词作状语的偏正结构。必须以“简”换“检”,才能说清原初构词的意图和缘由。

常有人讥讽求本字的作法,以为是古代小学家的一种“莫名其妙的癖好”。其实,求本字是探词源、别词义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汉语研究不同于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研究的特点所在。在书面语中,字的使用一经改变,词的发展源流便因此而产生阻隔,变得脉络不清。解决书面文献的语言问题,不可能不涉及汉字的使用问题。而且,为书面文献中的词语求本字,因为有大量的语言材料可以参照,有不同的版本可以对勘,有充足的训诂材料作依据,一般是可以避免主观随意性的。

## 五 词汇教学与古今汉语的沟通

以往的双音词构词法立足于用现代汉语的句法来界定双音词

的结构类型,而不顾语素之间的意义关系。这种研究方法遇到两方面的困难,一是很难区分词与词组,二是相当一部分保存古义的语素或保存古汉语语法形式的双音词用现代汉语的句法关系很难分析。实际上,由词结合为词组适用于句法原则,而由语素构成词则不完全适用于共时的句法原则。双音词一般具有以下不同于词组的特性,具有以下特性之一的可认定为结合紧密的双音词:

1. 语素不自由的特性;
2. 非词源化的特性;
3. 非现行语法的特性;
4. 非直接语义搭配的特性。

以上四点,大多要参考词源才能明辨。为此,训诂学在双音词研究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在汉语词汇教学中,强调古今差异的同时,也必须同时看到古今汉语的沟通。这首先是因为,词汇的发展是累积式的。共时平面上使用着的词汇,虽然为了适应共时的系统不断发生着内部能量的交换,这种交换必会影响到个体词语形式和内容的历时变化;但是,就其来源说,词汇的构成因素大多是此前各时代词语的积淀。不对词语作历史的考察,既不能从根本上认识和解释现代词汇的各种现象,也不能深入、准确地阐释每个词语的意义与文化内涵。其次,从教学方法来说,古今沟通的原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原则,它既有利于通过已知来掌握未知这一教学方法的实施,又有利于在语言教学中树立承认历史、尊重传统的正确观念,纠正把历史和现实对立起来,把口语与书面语对立起来的语言观。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贫乏,原因之一是忽略了词汇的历史考察。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体现了古今沟通的精神,才能使现代汉语词汇的研究与教学进一步丰富起来。

本文最后要说的是,训诂学无疑是立足于古代书面文献语言

的,但它完全能够也必须关注现代词汇的形式和意义,只有这样,它的生命力才会更加旺盛。

(王 宁 100875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 曹志耘)

---

## 简 讯

【本刊讯】98 现代汉语语法学(国际)学术会议将于 1998 年 8 月下旬在北京大学召开。会议包括两个阶段性研讨会:第 10 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第 6 次青年现代汉语语法研讨会。前者的两个议题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语义问题,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后者的议题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与应用,包括三个子议题:语法研究与认知科学,语法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语法研究与汉语信息处理。有关会议事宜可与 100871 北京大学中文系袁毓林博士、沈阳博士联系,电话/传真:(86-10) 68520877, E-mail:syshen@pku.edu.cn。

【本刊讯】本刊主编曹志耘教授的专著《严州方言研究》(日本东京好文出版株式会社 1996 年 9 月出版)最近荣获第七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金二等奖。严州方言是浙江省西部的一种颇为特殊的方言,曹志耘在日本三菱基金会的资助和日本京都大学平田昌司教授的支持下,从 1993 年起对严州地区四个县城和部分乡镇的方言作了较为详细的调查。本书是作者对该地区方言调查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平田昌司先生的序和秋谷裕幸先生的书评《姿を现した严州方言》(日本《东方》杂志 198 号,1997 年 9 月)均对本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